

# 张闻天与少年中国学会

叶菊珍

(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四川成都,610068)

**摘要:**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学会中,他是一名积极活跃的会员,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学会也对张闻天的思想、人生道路及工作作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人生道路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键词:**张闻天;少年中国学会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3-0102-06

张闻天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张闻天走上革命道路之前,也同中国当时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一个“向光明地方摸索的时期”。在他摸索救国真理的进程中,“五四”时期最大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本文试图从张闻天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入手,考察“少年中国学会”对张闻天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探究张闻天的革命思想及一贯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工作方法的源流。

## 一 张闻天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少年中国学会”是1918年6月四川温江人王光祈和李大钊、孙少荆、穆济波、陈郁等人发起组织的一个青年社团。在宣传新文化、研究新思潮的历史洪流中,该学会迅速成为“五四”时期规模最大的著名进步社团,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赵世炎等日后的中共领袖也曾经是该学会的重要活动分子。

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大约是1919年12月。据“少年中国学会”的刊物《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新加会员》记载,“本会于去年十

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其人名通信处如下:姓名张闻天,行号闻天,年龄20,籍贯江苏,通信处上海西门黄家阙67号宗白华转,在本会文科。同期入会的还有毛泽东、芮学会[1]。

其介绍人,按《张闻天年谱》的说法,是左舜生、黄仲苏[2](17页)。但据学会老会员魏时珍1984年回忆,其介绍人应该是宗白华、魏时珍和王光祈<sup>①</sup>[3](289页)。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按照学会的规定,新成员入会,须有五名会员介绍。因此,我认为这两段材料似可相互佐证,左舜生、黄仲苏、魏时珍、宗白华、王光祈当同为张闻天人会的介绍人。

张闻天人会后,一直很关注学会,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众所周知,“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对成员没有具体的活动要求。但是,张闻天只要在国内,都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1920年1月,《少年中国》的姊妹刊《少年世界》创刊,张闻天和沈泽民共同负责其校勘和出版事务[2](18页)。1921年1月,他又与上海的会

收稿日期:2002-06-18

作者简介:叶菊珍(1965—),四川省仁寿县,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副教授,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指导教师侯德础教授。

员一起向学会交“自由储金”，并提出将储金用于办学的主张[2](25页)。同年3月，同左舜生、沈泽民等会员在上海市郊龙华聚会，议定7月15日成立学会上海分会[2](26页)。同年7月1—3日，张闻天出席了学会南京大会，并报名参加了学会设立的东方哲学研究会和社会学研究会[4]。会后，他写了关于“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书面意见，发表于《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嗣后，张闻天赴美留学。到1925年10月，张闻天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会此时已名存实亡。但是，他仍关心着学会。当月，他还发表声明赞成王光祈刊行《少年中国》“研究专号”以代月刊的“紧急提议”，并担任“文艺研究”特约撰稿员[2](72页)。

在组织上，张闻天积极为学会介绍会员。1922年1月，他和左舜生介绍了郝坤巽、童启泰、康纪鸿入会[2](32页)。到美国后，1923年，他又与康白情、孟寿椿一起介绍须恺、杨亮等加入学会[2](48页)，从而将学会组织扩大到了美国。

更为重要的是，张闻天对学会还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他加入学会后，在学会的两大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上都发表了不少文章，或针砭时局，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翻译国外名家的作品，这些文章扩大了学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尤其是发表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上的《对少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更表达了张闻天对学会的拳拳之心。这篇文章写成于1921年7月23日，即学会南京年会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作为“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进步团体，虽然集合了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但它“不是为了一定的明了的目的而产生的”，而是“在乎一种模糊不明的感觉，即对于现社会不安，想谋改革的感觉而产生的，它所注重的仍是感情的结合”。所以，当中国社会发展到要求有一种救国的科学方案时，分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会于1921年在南京开会讨论要不要主义的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有的主张要主义，有的主张不要。要主义者有的主张信仰社会主义，有的主张信仰国家主义，还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意见一时竟无法统一。其成员也因经历与环境的差别，思想各异。思想右倾者遂成为国家主义的信徒，思想左倾者参加了共产党，还有的投身政界作了官僚。张闻天带着“一则听听会员之间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意见，二则见识见识本会的会员”[4]的目的参加了这

次大会，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会后他针对“少年中国学会”存在的问题，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发表，很具体地阐述了他对学会的看法。

第一，张闻天对学会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回顾了学会产生的过程，肯定了学会存在的意义。认为：“自民国以来，中国内部弄得昏天黑地，不见天日，更兼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加速度的侵犯进来，把中国人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破坏了，于是中国人一直水平线滚到了深渊之底。”一些想谋社会改革的热血青年联合了几个有同样感觉的人，成立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也就呱呱堕地了”。他认为学会尽管有缺陷，但应该看到它“这一时期（少年期）是各会员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时期，各个会员都能摸索，这就是我们学会的进步”。

第二，他也明确地指出了学会的不足。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之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创造少年中国”。创造少年中国是最终的政治目的，社会活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科学精神则是指导活动的理论。学会创始人王光祈还根据学会精神写成了一首《少年中国歌》，其中说：“少年中国主人翁，昂然独立亚洲东，环顾四邻兄弟国，多在他人压迫中。朝鞭夕唾，弗如犬豕，观此不平，安能自己？且上昆仑山，高呼起起起。”[5]这奋发向上的声音，在当时不知激动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但这首歌与它的纲领一样是非常空泛、模糊的。所以，张闻天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什么是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何在？这些问题，凡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都日夜自问的。但是，少年中国是一种理想，各人的知识不同，经验不同，自然他们的理解也不会相同。”因此，“学会的目的自然也是徒托空名，无济于事的”。接着，他提出：“我们现在除会员之间相互联络外……并且同时对于‘少年中国是什么’等问题，好好地求一个解答，就是好好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这理想就是我们以后的主义，是切合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和人民好的心理，不是闭着眼睛像玄学家的讨论‘本体是什么’。”这表明张闻天对学会的局限洞若观火，但他又多么希望学会能提出合乎中国实际、有益于人民的宗旨。

第三，张闻天对学会会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他说：“少年中国学会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组成的团体，所以，少年中国学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完全依赖少年中国学会的各个会员的实力充足。

假如没有这种充实的、有生命的会员,少年中国学会就是有很好的外表,博得人家的喝彩,也不过是一块金字招牌。一上人生的大战场立刻就会败绩下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四信条是必备的资格。他还对会员在道德、恋爱、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批评,希望本会会员,“不要专门向外界注意,拿一部分精神的光明,去光照内心,发现那隐藏于黑暗中的恶魔而去之”。这席话可谓切中时弊,发人深省。

可见,张闻天在学会虽非创始人,也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但他在学会中也是比较活跃的会员。他积极参与学会的活动,努力按照学会要求介绍会员,尽量加强与会员的沟通,为学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因此,张闻天对学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

## 二 “少年中国学会”对张闻天的影响

张闻天加入学会前,已是一个热心政治,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激进青年学生。他曾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亦是当时南京学运的进步刊物《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和重要撰稿人。他主张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将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废除”,然后建立民主共和国[2](14页)。“五四”以后,他也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6](9页),但并不认为这是自己追求的真理。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学会对张闻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其一,会员对张闻天的思想及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少年中国学会非常注重感情的结合。正如后来其成员宗白华所说,那时“少年中国学会的青年朋友们相见时,不论识与不识,都感到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愿望,并以胸怀坦荡相示,大家一见如故”。学会不仅激发了张闻天的政治热情,而且也使他结交了一批胸怀大志的青年朋友,如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即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后来更成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与张闻天交好的,还有后来知名的现代美学家、诗人宗白华,北大哲学系学生、以白话新诗而闻名的康白情,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田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沈泽民、国家主义者左舜生等,这些抱负不凡的朋友和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严酷现实,共同促成了张闻天思想的转变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张闻天后来长期在党内从事宣传和干部教育工

作,这与他在学会中积累的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张闻天的个人兴趣原本是哲学,后来才转向文学,张闻天日后的一篇文章也约略提到过这种改变,说好几年前,“研究过现代哲学思潮,可是后来因为天性与哲学不相近,改习了文学”。其实,这种转变开始于1920年7月同挚友、也是学会会员的沈泽民一同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与同是会员的田汉关系密切。据《张闻天年谱》和《田汉年谱》记载,“在东京田汉寓所,与田汉、郑伯琦、沈泽民等畅谈通宵”。田汉称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痛谈”[7](45页),后来双方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正是受田汉和沈泽民、沈泽民之兄茅盾的感染,张闻天开始接近文学,在日本时就给《小说月报》投稿。据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回忆,张闻天当时写过《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波特来耳研究》以及三篇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内容和文采都不错[8]。回国后,他除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外,亦从事翻译,显示出他那翻译家的才华。张闻天的名字开始不断出现在当时最有名的文学刊物上。因其文才出众,1921年7月,经学会会员左舜生介绍,张闻天到中华书局任“新文化丛书”编辑,又与田汉同室办公,朝夕相处。此后,经过在美国的学会会员康白情介绍,张闻天被聘为美国华人《大同报》编辑。旅美期间,他翻译了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戏剧家倍那文德的作品。回沪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旅途》和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所以茅盾先生说:“我相信,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他在文学上的才华。”[8]

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也与学会密切相关。加入学会前,张闻天热衷的是无政府主义。他在1919年8月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对无政府主义作了翔实的介绍。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主张[6](9页)。刚入学会时,学会流行新村主义,王光祈不仅大力宣传,而且还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了“工读互助团”。当时张闻天和王光祈关系较为密切[3](288页),也深受影响。在1920年1月写的《农村改造的发端》一文中说,改造旧社会的第一步,“要从农村做起”,还提出了农村改造的方法:“每村自成一个组织,同国家可以脱离关系,不过国家可以做各团体联合的总机关,

无政府的必要”。可见,此时的张闻天已经由主张无政府主义转为“新村主义”。正如后来他自己回顾这段经历时所说的:那时“对现有秩序感到不满,渴望实现当时在我面前被描画得迷茫飘渺而理想化的新制度”[2]。但新村运动在现实中的迅速失败,使张闻天不得不放弃这种思想,转而主张泛爱哲学和无抵抗主义。1921年夏,他写了一些文章,宣称“爱”能养成“高尚的人格”,无抵抗主义是“使灵魂不染一点污点的最好方法”,推崇耶稣、释迦牟尼,说他们所实行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提出学会要创造的“少年中国”就是“爱的天国”[2](26页)。他的这些说法受到茅盾、陈望道等人的批判,双方展开了一场认真的讨论。结果,诤友使他逐渐放弃了自己的主张。1922年1月,他发表了《中国的乱源及解决》一文,对中国乱源进行了分析,对实行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2](33页)。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此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引领张闻天走入共产党阵营的是沈泽民。沈泽民,浙江桐乡人,著名作家茅盾的胞弟,是张闻天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同学,两人一起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一起在上海负责学会刊物《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一起在上海浦东中学宿舍自学日语,一起赴日留学。两人都与田汉过从甚密,后又成为中华书局同事,又一同到上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沈泽民堪称张闻天青年时期交谊最深的挚友。但不同的是,沈泽民在加入学会后不久,1921年5月就加入了上海共产党小组,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沈泽民探索并选择共产主义的时间比张闻天短,也在关键时刻给予了张闻天正确的指导。正如茅盾所说:“大约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闻天同志回国,到中华书局任编辑。闻天同志进中华书局是左舜生介绍的。左舜生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早在中华书局当编辑了。左当时是国家主义者。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有许多国家主义者,他们正在筹备组党。左舜生极力拉拢闻天同志,企图把他拉进他们那个组织。此时,泽民从日本归来后,已经加入共产党,他就劝闻天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那时也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李达同志的鼓动,结果,闻天同志加入了共产党。”[9]这说明是沈泽民将张闻天介绍入党的。

如前所述,张闻天在真正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前,

他主张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无抵抗主义、泛爱哲学等。在此过程中,他也曾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也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但他又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却“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2](33页)。直到1924年1月,他从美国归来,再度受聘于中华书局,因与共产党员沈泽民、茅盾的关系,开始广泛地接触共产党人,可是由于“一心于个人的文艺活动,故还是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怕加入它不自由”[2](52页)。但是,就在这一时期,他参与了学会内与国家主义的论战,提出了只有革命,推翻现政府,获得政权,才能解决现存的一切问题。明确表示支持恽代英、杨贤江以科学精神扫荡复古逆流的意见和沈泽民“革命文学”的主张[9],并开始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和翻译,故被中华书局辞退。离开中华书局后,张闻天受学会友人康纪鸿之邀赴成都。路经重庆时,被友人蒋锡昌留住,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员,在重庆开展革命活动。经过重庆的生活与斗争,他对旧势力的压迫和新生力量的支持更有了切肤之感,认识到要战胜旧势力必须有联合力量,“而共产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于是“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动机”[2](67页)。1925年5月,离渝抵沪后,参加了“五卅”运动,明确表示要“加入CP”[2](69页)。同年6月,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因此,张闻天同许多人一样,也不是一条直线走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的,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也有过苦闷和彷徨,经历过曲折和坎坷,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痛苦、烦闷的阶段,对真理的把握才可能趋于全面,对真理的信仰也才会牢不可破。所以,张闻天后来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蒙冤受屈,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都至死不渝,从未动摇过。

其二,“少年中国学会”对张闻天一生坚持的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有深刻影响。

张闻天在党内一向是以注重实际、强调调查研究著称的。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关键”,“要反对那些讲大话,订大计划,而不肯或不会脚踏实地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等等。张闻天这

种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的形成与少年中国学会风气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少年中国学会的四大信条中有一条就是“实践”，很多会员都以“务实”自诩。学会创始人之一的王光祈是身体力行，着力实干的[3](291页)。重要成员魏时珍也说：“吾国之人，患在空谈，将欲救之，非用实学。”[1](第3期)在学会同仁强调务实的氛围中，张闻天也强调采取实际的手段来发动民众。如：1924年5月，他发表《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一文，在谈到鼓动民众的方法时，就批评“单单说中国民族性的优良或是单单用历史地理的教授去鼓励民众”的方法是“不中用的”，“单用爱国呀，同胞们”这种论调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不切合老百姓的实际，而应该针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对症下药。应该大声说：“你们如要吃好的菜，穿漂亮的衣服，讨一个好老婆，生几个好孩子，你们非大家一致地起来把现政府推倒不可，不然你们这种地狱似的受罪生活是没有穷尽的。”[9]这些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仍振聋发聩。

张闻天在学会中还曾负责校勘出版刊物《少年世界》。该刊的宗旨是：作社会的实际调查，谋世界的根本改造。它与《少年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少年中国》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而《少年世界》则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1]。其内容确实相当丰富，辟有“学生世界”、“学校调查”、“教育世界”、“工厂调查”、“农村生活”等栏目，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当时国内外工人、学生和侨运动的状况、工厂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其中，调查报告占了《少年世界》的最大篇幅[10](276页)。《少年世界》从1921年1月创刊到

12月停刊，共发行了12期，张闻天和沈泽民从1月开始负责校勘出版事务，直到7月赴日本留学。这段时期，他还深入到工人中去，工人的痛苦让他心碎，于是，他写了《心碎》一诗，诉说铁店里的男儿和丝厂里的女子劳动的繁重和内心的悲愤，这表明张闻天已经开始注重社会实际。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后，张闻天怀着要“学习更正确的革命理论与实际行动”的愿望留学苏联，在提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同时，却逐渐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以致在一度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侵袭下走了一段弯路。但在遵义会议上，他又毅然与错误路线决裂，为力挽狂澜立下了大功。延安整风时期，他更是虚怀若谷，又主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力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重新深入社会调查研究，为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闻天对少年中国学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少年中国学会也对张闻天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指导。张闻天加入时年仅20岁，既是风华正茂之时，也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学会兼包并蓄，容许各种思潮存在其间，在给他提供思想自由发展机会的同时，又培养了他闻过则喜、海纳百川的情怀。少年中国学会的风格和优秀会员给予他许多好的熏陶和及时的帮助，少年中国学会在张闻天的人生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如沈泽民所说：“少年中国学会的特色便是在同时包容一切冲突的观念，而在这纷乱之中找出一条向上的道路。”[4]张闻天正是经历了一阵纷乱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条“向上”之路的。

#### 注释：

①据魏时珍回忆：张闻天，沈泽民，江苏人，浦东中学学生。“同济”与“浦中”相距甚近。一日，我与白华得闻天和泽民信，想和我们晤谈。我们得信，即邀他们到白华家相聚，他们来后，辄纵横议论，意气英发，自午后至傍晚始去。我们观其容貌，少年英俊，当幼于我们一、二岁。而听其言论，则激昂慷慨，有若成人。我们惊异，即书告光祈。不久，闻天与泽民，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了。

#### 参考文献：

- [1]少年中国，第1卷.民国10年2月15日.影印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2]张培森.张闻天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 [3]毕兴，苑树青.黄钟流韵集[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 [4]少年中国，第3卷.民国10年9月1日.影印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5]刘平.戏剧魂——田汉评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6]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一[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7]张向华.田汉年谱[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8]茅盾.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N].人民日报,1980-01-14.  
 [9]少年中国,4,(12).民国13年5月.影印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8.

## Zhang Wentian and Juvenile Association of China

YE Ju-zheng

(Sichuan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for High Learning Institution Teachers,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December of 1919 witnesses Zhang Wentian's joining the Juvenile Association of China, where he is an active member and makes active contributions to its development, and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Zhang's ideology, life way and work style at the same.

**Key words:** Zhang Wentian; Juvenile Association of China

[责任编辑:凌兴珍]

(上接 23 页)

(五)崔篆《慰志赋》“嘉昔人之 辰兮”(p. 250)。按:据《后汉书·崔骃传》,空格字当为“遘”。又“岂修德之极致兮”,“修”本作“脩”。又“受符字乎良维”,“良”本作“良”。李贤注云:“良,东北之位。谓篆为千乘太守也。”作“良”甚为不辞。

(六)冯衍《显志赋》“采三秀之华英”(p. 261)。校记云:“李贤注曰:‘《东观记》及《衍集》‘秀’字作‘奇’,‘莫’作‘灵’。”按:贤注末句本作“‘英’字作‘灵’”,“莫”字误。

(七)杜笃《首阳山赋》“九折菱 而多艰”(p. 271)。校记:“此句录自《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李善注。”按:空格字当为“崑”。

(八)梁竦《悼骚赋》“彼促尼之佐鲁兮”(p. 276)。按:“促”当作“仲”。

(九)傅毅《洛都赋》“体神武之圣姿”(p. 278)。校记云以《艺文类聚》卷六一所录为底本,补以《初学记》卷二四等。按:《初学记》卷二四“姿”作“资”。又,“寻历代之规兆”,《艺文类聚》卷六十一“历”作“往”。又,“豆三涂太室结于前”,“豆”字衍。又,“垂菡萏之敷荣”,“敷”本作“敷”。又,“于是乘兴(興)鸣和”,“兴”本作“輿”。又,“传(傳)说作仆”,“传”本作“傅”。又,“出游濑之潜鳞”,“游”本作“旋”。以上“姿”、“历”、“敷”、“兴”、“游”,同严氏辑本。

(十)崔骃《大将军临洛观赋》“临轩檻以观鱼”(p. 297)。校记云用《艺文类聚》卷六十三所录为底本,参校《太平御览》卷二〇。本句校云:“‘檻’,《御览》作‘檻’。”按:检《御览》卷二〇无此条。又,“弛辇纵策”,校记云:“‘弛’,《御览》作‘弛’。”按:检《御览》卷二〇,亦无此条。复检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亦录自《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而录作“弛”,亦误。

(十一)班固《终南山赋》“上挺修竹”(p. 353)。校记云以《初学记》卷五所录为底本,又以《古文苑》等为校本。按:“竹”,《初学记》作“林”,作“林”是,故与上下文“神”、“沉”、“心”等为韵。复核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已误作“竹”。中华书局刊严氏本于书眉有校语:“竹当作林。”

(十二)班昭《大雀赋》“故翔万异(異)而来遊”(p. 370)。按:依校本,“异”本作“里”。

(十三)李尤《函谷关赋》“包入极以据中”(p. 376)。按:“入”本作“八”。